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减贫

贾 朋 都 阳 王美艳*

内容提要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如何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好地实现减贫，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利用多种来源的宏观和微观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对经济发展和减贫做出贡献，以及现阶段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减贫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指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相对充分的条件下，对于仍然存在的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辅之以新的减贫方式，例如加强社会保护制度建设。本文还总结了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 减贫 社会保护

一 引言

在过去的近 40 年中，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乃至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正是由于持续经济增长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中国得以改善世界 1/5 人口的福祉，实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减贫。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和改革开放进程是同步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 贾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jiapeng@cass.org.cn；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电子邮箱：duyang@cass.org.cn；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wangmy@cass.org.cn。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刘易斯转折期间的劳资关系治理”（7147326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贫困地区人口的动态变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7154103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研究”（71642003）的资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对扭曲的传统经济体制不断纠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传统劳动保障政策,以劳动力资源城乡分割、排他性城市全面就业和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为主要内容。传统劳动保障政策的严重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种二元分割体系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其次,这种政策体系导致激励机制缺乏,劳动积极性严重不足;最后,这种政策体系造成的城乡差距和不公平掩盖了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Lin et al., 1998)。

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在纠正上述体制上的扭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迈进的过程,也是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和非农部门的流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Roberts, 2006)。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除了源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还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补偿效应”。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实行的城乡分割体制使得城乡比例严重失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和城市地区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以前体制扭曲的补偿。其二是“发展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界领先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这一过程也就必然会伴随着城乡经济关系、农业和非农关系的转变,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必然以超常规的速度转移。其三,改革开放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形成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推力。基于这些因素,在中国完全实现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其特点也呈现出多样性。首先,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不断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2015年外出农民工达到1.69亿人(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6)。农民工已经成为非农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劳动力供给源泉。其次,从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特征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较早期阶段,年轻劳动力是转移的主体;随着转移过程的推进,青壮年农民工比重持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第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最初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其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分布最为集中),逐渐转变为中西部地区开始吸纳更多的外出劳动力。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特点仍然非常突出,消除体制障碍仍然是促进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内容。

从不流动到流动、从小规模流动到大规模流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一个独特

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国改革进程紧密相连。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流向城市和工业部门，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改变了人口空间分布，推动了城市化发展。

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贡献则更为直接。贫困地区的农村面临着多种资源禀赋的约束。一般而言，贫困地区也是资本稀缺的地区，同时，从地理及区位看，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往往是偏远的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会因此面临恶劣自然条件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可能是贫困家庭拥有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尤其是劳动力跨地区的转移，贫困农户不仅可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也可以摆脱流出地经济欠发达、非农就业机会欠缺的约束，利用其他地区的发展机遇，带来减贫效应。除了减贫效应之外，劳动力迁移的过程也是人力资本提高和积累的过程。

本文将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和减贫的贡献，考察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减贫面临的挑战，同时，我们将就中国近 40 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所产生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从而对其他正处于同样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二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和减贫的贡献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城乡经济关系转变的过程。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边际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转移，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改善，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劳动者通过劳动力转移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改善，有利于增进他们的福利，从而成为农村减贫的重要手段。

（一）劳动力转移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丰富而二元经济特征极其明显的发展中国家。从资源禀赋的特点看，资本的稀缺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的制约条件和格局。因此，摆脱经济的二元特征，实现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禀赋优势，规避资本稀缺所带来的制约。最大规模地扩大就业，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就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中国过去近 40 年的发展历程，正体现了上述规律。通过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挖掘就业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效率源泉。这其

中,农村劳动力持续地转移,使中国制造业得以在很长的时期内保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并激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使中国制造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即便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仍然保持着相对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优势。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德国的29.7%、韩国的36.7%和美国的38.7%(蔡昉、都阳,2016)。可以预期,只要能够正确处理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关系,在一定时间内中国制造业仍将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并为中国经济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提供重要的动力。

正因为如此,即便在国有经济改革后,城镇职工在制造业部门就业数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却不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统计,外出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由2003年的25.2%,上升到2009年的39.1%^①。

类似地,在其他非农产业,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2015年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总数达到7500万人,占该年度外出务工农民工总数的44.5%。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无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部门就业,转移出农业的农村劳动力都会有更高的劳动边际产出。因此,劳动力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流动,形成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这种配置效应也意味着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并构成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根据以前研究的测算(蔡昉、王德文,1999;世界银行,1997),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20年,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间。

我们看到,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越来越充分的流动,劳动力在农业中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将越来越接近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由于前一个效应逐步扩大,也会因为后一个因素而有所减小。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的统计,2015年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为31.1%。这里的农民工,既包括本地农民工,也包括外出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高于本地农民工。

目前，对最近 10 年来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经验估算，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农业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估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我们可以得到农业雇工的价格。我们假定，在农村的劳动力市场上，雇工的价格反映了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我们以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稻谷、玉米和小麦）的雇工价格作为农业雇工的价格。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我们假设农民工的工资等于其在非农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可以预期，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①，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非农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将逐步趋同。

例如，2001 年农业雇工价格是农民工工资的 61%，到 2015 年该比例上升到 75%。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开始减小。但从总体上看，劳动力转移的绝对规模却在增加。根据农民工总量信息以及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差，将二者相乘的结果再乘以非农工作天数，我们可以估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总量。由此，我们根据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效率提高部分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就可以计算出劳动力流动贡献的份额，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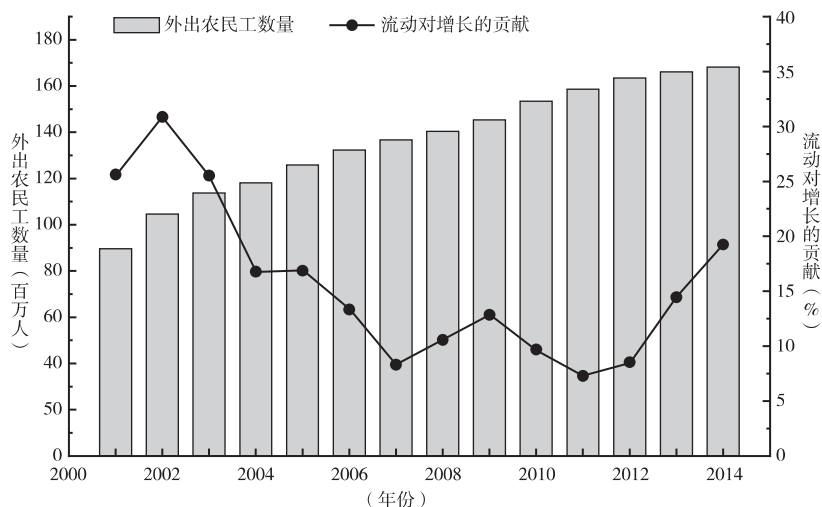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武志刚和张恒春（2010）、Wang（2010）以及都阳（2010）等计算得到。

^①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有关分析，可参见蔡昉（2008）。

我们看到,即便由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但其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以2012年为例,根据上述估算,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8.6%^①。而且,这还不包括从农业转向本地非农部门就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以及外出务工但期限在半年以下的劳动者的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 劳动力转移是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基本手段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伴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逐步增加,劳动力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也日益明显。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受价格信号的引导,因此,劳动力由劳动边际报酬低的地区向边际报酬更高的地区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迁移规模的扩大和收入的增长,劳动力迁移对缩小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就会更加明显。通过对地区之间加总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流动有可能已经成为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主导性因素。

图2展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指数的变化情况。20世纪80年代,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都着眼于微观激励机制改革,所激发的技术效率提高也具有普遍的增长效应。我们看到省际人均GDP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43,下降到1990年的0.261;如果以人口为权重,则这两年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28和0.208^②。由于在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仍然有限,因此,尽管转移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但尚不足以成为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的主导力量。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中国经济经过短暂的调整后,1992年开始恢复了强劲的增长,而市场配置效率开始在经济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开始伴随着区域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拉大,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上升到2003年的最高点0.32。

2003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转移的形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继续扩大,也表现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工资的迅速上涨。同时,产业的区域间转移开始出现,中西部地

① 2012年以来,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略有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工资和农业雇工价格之间的差距拉大导致的。

②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也是中国人口密度高的地区,而西部省份的人口数量相对少,因此,以人口为权重计算的区域经济不平衡指数更小。这一效应也为很多研究所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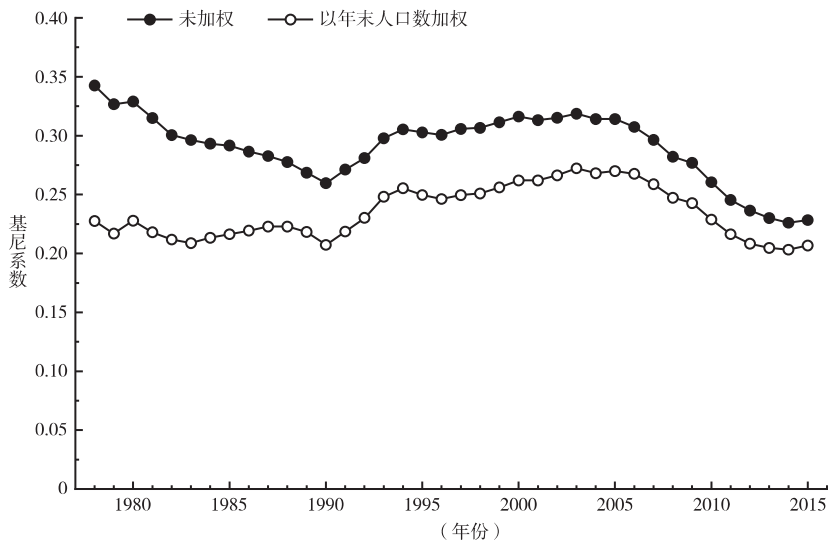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1978 - 2015 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区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对区域间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如图 2 所示，度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指标在 2003 年达到峰值以后开始下降。虽然构成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地区间收入差距转折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契合，也充分说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区域间收入差距影响的另一个维度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作为一个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经济体，城乡收入差距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收入差距最主要的来源。相应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除了需要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在公共政策方面予以额外关注以外，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手段。

虽然城乡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是不争的事实，但现行统计体系在城镇和农村收入调查中都没能有效地覆盖农民工群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抽样偏差（Park，2008），导致对收入差距的高估^①。而且，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也难以得

^①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调查制度，加强了对流动人口和城乡结合部人群的覆盖。

到很好的衡量。目前尚难以找到对总体具有代表性的时间序列资料，以分析将农民工涵盖在内的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包含劳动收入的信息，可以用于观察在现有的城乡收入统计中加入农民工会对收入差距产生何种影响。表1中第1列的分析仅包括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这是通常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第2列则是将农民工涵盖在内，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估计的情形。该表显示，如果将农民工涵盖在内，全部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均下降。

表1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有偏和无偏的估计

	农村劳动力 + 城市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 城市 劳动力 + 农民工	变化(%)
p90/p10	10.642	10.145	-4.67
p75/p25	3.604	3.694	2.50
GE(-1)	0.668	0.657	-1.65
GE(0)	0.422	0.408	-3.32
GE(1)	0.425	0.407	-4.24
GE(2)	0.740	0.705	-4.73
Gini	0.484	0.474	-2.07
A(0.5)	0.190	0.183	-3.68
A(1)	0.344	0.335	-2.62
A(2)	0.572	0.568	-0.70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可以预见的是，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愈发明显。换言之，忽略农民工群体对估算城乡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偏差就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2005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为1.26亿，月平均工资水平为821元（2001年价格）；到2015年农民工数量增加了34.1%，实际工资水平增长了196.2%。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会更加明显。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减贫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都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如图3

所示，2015年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中近60%来自于劳动收入，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近40%来自于工资性收入。考虑到农业家庭经营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劳动的投入，因此，来自于劳动要素的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实际比重应该更高。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和城市家庭相比，农户对劳动力市场收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如图3所示，1990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为20%，到2015年该比重已经上升了近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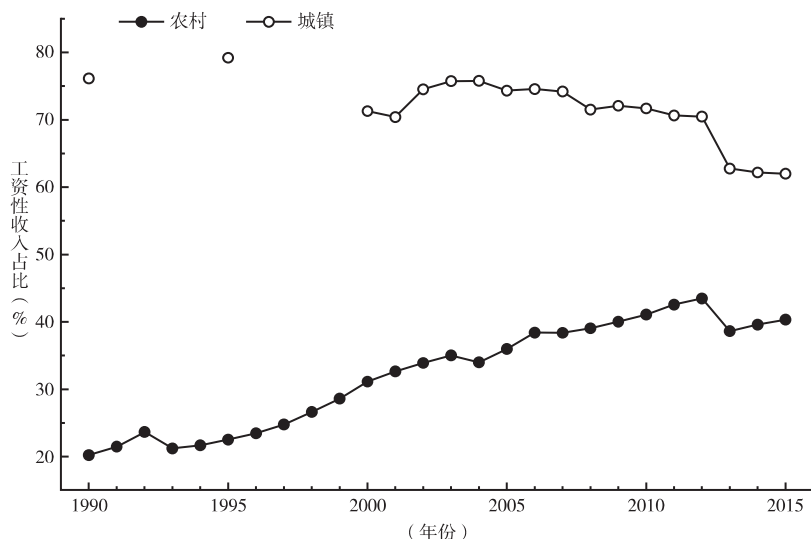


图3 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注：2012年以前（含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纯收入；2013年及以后，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均为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我们可以从图4进一步观察工资性收入对于提高农民纯收入的作用。图中横轴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比重，纵轴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图中的每个点代表一个省份。简单的拟合表明，工资性收入比重越高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越高，拟合的优度为0.63。图4所描绘的关系表明，富裕地区的非农劳动力市场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农户也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非农劳动力市场。同时，农村居民对非农收入的依赖性也越强。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工资性收入是农户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如果我们预期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将遵循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那

么，未来这些地区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比重也会继续上升，并成为农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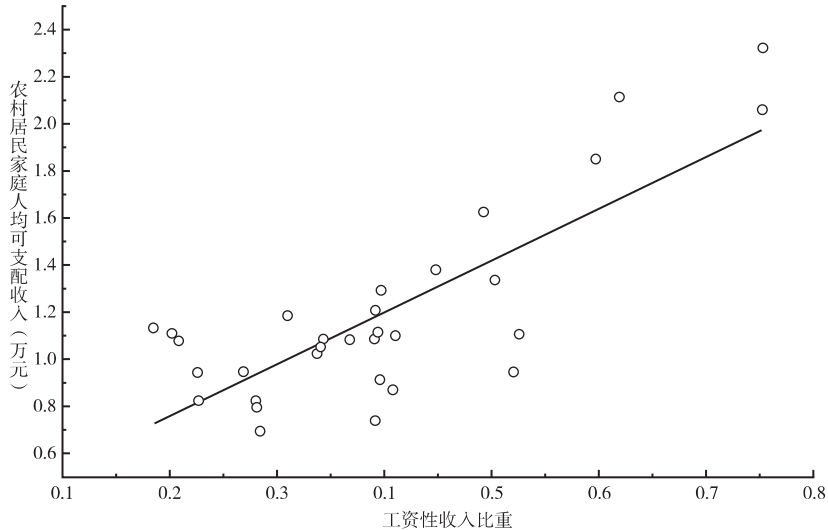


图4 2015年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计算得到。

该图还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工资性收入比重存在着很多差异性。例如，2015年工资性收入比重最高的省份（不包括直辖市）是浙江（62.0%），而最低的新疆仅为18.5%。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仍然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户而言，由于其拥有的资源禀赋有限，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所能获得的经济机会相对匮乏。这时候，劳动力资源是贫困家庭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一旦劳动力市场流动的障碍逐步减少，贫困家庭就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将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本地或异地的非农劳动力市场，并通过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获得减贫效应。

从减贫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的角度看，鼓励贫困地区的农户通过迁移减贫，实际上是充分利用贫困家庭对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通过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决策，自发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于其他贫困干预措施，利用劳动力转移实施减贫，其政策执行的成本相对较低。利用劳动力转移减贫，所对应的政策措施往往是一些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举措。这种对人投资的过程，不仅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

手段，其本身也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目标。

经验研究 (Du et al., 2005) 表明，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自 1990 年代后期持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贫困的家庭迁移的可能性在增加。相形之下，农户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作用趋于下降。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人口迁移 (马伟等, 2012)，公路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贫困村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汪三贵、王彩玲, 2015)。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大大促进了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逐步完善，劳动力在地区之间流动的障碍逐步减少，使得来自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户，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市场减贫。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贫困线周围的农户，比更贫困或更富裕的农户做出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可能性更大。通过迁移等形式的劳动力转移，贫困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可以提高 8.5%~13.1% (Du et al., 2005)。基于贫困地区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还表明，贫困家庭的农户一旦将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劳动力转移后对家庭的贫困是有反应的。直接的证据体现为从贫困家庭转移的劳动力，通过汇款等方式向其他家庭成员转移的收入更多。在西部贫困山区，温饱仍是农户关注的首要问题，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汇款更多地被用于食物消费 (李树茁等, 2011)。

三 劳动力转移与减贫面临的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实现减贫，但是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农村贫困家庭都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实现脱贫。尤其是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相对充分的条件下，对于仍然存在的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辅之以新的减贫方式。同时，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在社会福利体系尚没有实现一体化的情况下，流动的农村人口在城市有可能形成新的贫困群体^①，这也是新形势下减贫体系所面临的新挑战。

(一) 利用劳动力市场减贫的局限性

我们的分析表明，一旦农村家庭有机会实现劳动力转移，利用城市劳动力市场，

^① 研究表明，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仅是收入贫困，农民工的消费、住房和社会保险等状况也令人担忧 (王美艳, 2014; 樊坚, 2007)。

那么该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逐步扩大,农村未转移人口的同质性也愈来愈强,具有相似的人口特征。农村未转移的人口以年老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为主,他们往往难以适应非农部门的就业需要,因此也难以利用城市劳动力市场(都阳、王美艳,2010)。正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种转折使农村贫困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扶贫政策也随之需要进行调整。

如果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做一个较为粗略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在这个阶段,农村处于全面贫困。经济体制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经济体制改革使一部分贫困人口迅速脱贫。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打开了出路。

第二阶段为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和扶贫攻坚阶段(1986-2000年)。在这个阶段,贫困的区域特征逐步显现。部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因素,难以实现自发的经济增长。政府通过实施扶贫政策,投入扶贫资金,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减少贫困。中国政府自198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以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

第三个阶段为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阶段(2001-2010年)。经历了前两个阶段之后,除了少数社会保障对象和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以及部分残疾人以外,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温饱的标准还很低。在这个阶段,需要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综合开发和全面发展。

第四个阶段为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阶段(2011年以来)。中西部一些省份贫困人口规模依然较大,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这个阶段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精准帮扶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

从农村扶贫开发的阶段划分我们观察到,贫困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人群特征在不断变化。如果农村贫困人口真正边缘化了的话,开发式扶贫战略的效果就将边际递减,需要转向更加注重瞄准个人和家庭的扶贫方式。怎样将各种扶贫方式有效衔接解决农村贫困,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诸多关注。随着农村减贫进程的推进,扶贫开发与

农村低保成为农村减贫的两个重要举措。中国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保证更多的贫困人口从扶贫开发 and 农村低保中受益，以尽快摆脱贫困。此外，针对连片特困地区不同的主导贫困原因，需要采取更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解决集中连片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

（二）迁移贫困与减贫体系的一体化

对于消除农村贫困而言，劳动力转移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生存状态也值得人们关注。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具有很强的非正规性特征，这也使得他们较之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面临着更大的脆弱性。随着在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前城乡分割的减贫体系也面临着挑战，扩大社会保护的覆盖，实现城乡减贫体系的一体化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任务。

与农村贫困大多以绝对贫困的形式出现不同，在城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贫困形式更加多元化，他们需要更多地面对城市劳动力市场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化比例要高于城市本地居民，这就意味着他们虽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但由于获得的社会保护有限，要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一直远远高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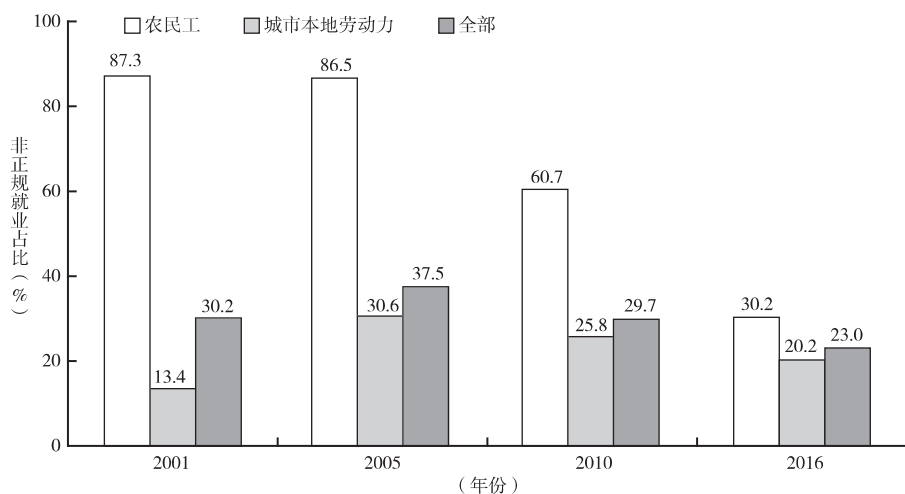


图5 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由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具有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工作稳定性差以及社会保护不足的特点,所以,农民工的就业集中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由此产生的种种脆弱性和贫困。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显示,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比,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和社会保障覆盖等指标上均存在明显的差距(表2)。如果仅从月收入观察,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为了挣得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同等水平的收入,农民工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例如,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更大,2016年农民工的平均周工作小时数比城市本地劳动力高出25.7%。因此,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小时收入率差异要远远高于二者月收入的差异。仍以2016年为例,城市本地劳动力的月收入较之农民工仅高出7.6%,而小时收入率则高出36.9%。

表2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脆弱性

	2001年		2005年		2010年		2016年	
	农民工	城市劳动力	农民工	城市劳动力	农民工	城市劳动力	农民工	城市劳动力
周工作小时(小时)	68.9	45.0	69.9	44.7	57.0	43.7	55.2	43.9
月收入(元)	1083	1265	1124	1527	2158	2368	4839	5206
小时收入(元)	4.02	6.93	4.17	8.55	9.75	13.50	24.10	33.00
养老保险覆盖(%)	6.27	37.45	12.36	72.61	26.42	77.85	32.60	80.82
失业保险覆盖(%)	—	—	6.84	32.80	10.40	51.82	31.57	71.11
医疗保险覆盖(%)	6.63	37.34	12.28	62.87	26.31	74.12	37.54	82.5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因此,尽管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以收入度量的贫困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但是,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更大,工作环境更恶劣,可能会对农民工的健康状况造成损害,并进一步传导为贫困(Du et al., 2006; 姜明伦等, 2015)。根据已有的经验研究,农民工的月工作时间每增加1小时,自评的健康状况下降0.02个百分点(Du et al., 2006)。换言之,如果农民工要保持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当的健康水平,降低劳动强度,则以收入度量的贫困发生率就会上升。据测算,如果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相当,则他们以收入度量的贫困发生率会上升15%~35%。

(二) 实现减贫体系与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使得原本各自孤立的乡城贫困现象彼此产生了紧密

的联系，也就是说，伴随着人口和劳动力的乡城迁移而产生迁移贫困。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迁移贫困现象非常普遍，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迁移贫困也较为明显，有的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贫困的城市化（Psacharopoulos et al., 1995）。对于绝大多数处于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但贫困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显然不是发展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前，在分割的城乡体制下，贫困自然无法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开始出现，但迁移规模有限，因此迁移贫困不明显。而且，对劳动力市场信号最先做出反应的，往往是农村劳动力中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劳动者。而这部分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会有更好的表现，他们在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也相对较低。

在劳动力流动不显著的情况下，贫困的分布就会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以区域为瞄准对象，集中地进行反贫困努力，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减贫措施。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农村反贫困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规模日益扩大，人口流动的构成也日益多元化：不仅包括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也包含越来越多的人口转移。Chan et al. (2003) 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解释了中国城市化因素的近 60%。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贫困的构成、水平和性质，治理措施就有必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然而，我们看到，相对于贫困形式的转变，减贫体系的改革并不充分。尤其是面对乡城之间贫困的联系，减贫体系没有相应做出调整。这有可能使得基于农村区域瞄准和城市反贫困体系的减贫措施，难以有效地瞄准由于劳动力在乡城之间流动而产生的迁移贫困。更重要的是，由于迁移贫困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保护的不足及其导致的脆弱性，因此，基于收入贫困为主的贫困治理措施，有可能对这种新的贫困形式难以产生实质的减贫效果。

鉴于迁移贫困的根源是社会保护制度的差异，实现社会保护制度的城乡一体化，将有助于从制度上避免贫困的流动。和很多国家相类似，中国的社会保护制度虽然仍然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但其主要构成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目前，这两大基础性的制度在城乡之间尚存在较大的差别，难以适应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无论是社会保障体系还是社会救助制度，制度设计的城乡分割都非常明显。社会保护在城乡之间的两种制度体系并行，导致了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以后，容易形成社会保护的真空。诸如养老、医疗和低保等社会保护的主要领域，都存在着类似的制度衔接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表 2 中几种主要的社会保障覆

盖，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力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而且，农村居民以及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社会保护差异，不仅体现于社会保护制度的覆盖，还表现为受益水平的差异。例如，农村居民目前已经普遍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所覆盖。我们看到表2中，2016年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覆盖率较之2010年有明显的提高。然而，比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水平，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为明显差异。例如，2015年，农民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医疗费用为人均177元，而城市职工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获得的报销额为人均3223元，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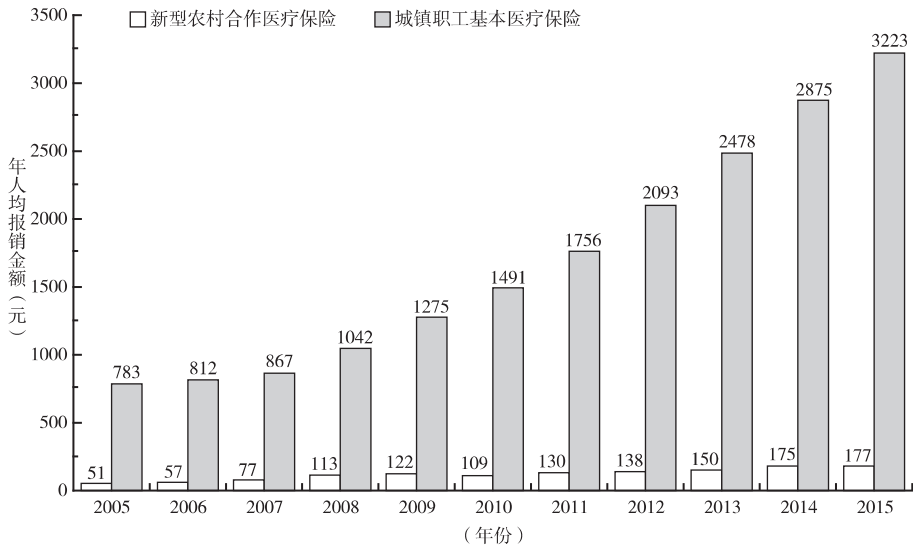


图6 医疗保险受益的差异

资料来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及以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综上所述，随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成为越来越不可阻挡的趋势，包括减贫体系在内的社会保护制度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只有实现了社会保护制度的城乡统一，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才能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一样有能力抵御不同形式的风险，从而降低所面临的脆弱性。社会保护制度的统一，不仅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实现城乡的统筹，也需要在受益水平上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四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转折性的变化，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业已结束，但中国仍然具有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利用劳动力市场减贫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

（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赋予农民择业的自由。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事实的经营主体，农户能够自主安排劳动时间和选择经营项目，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择业和流动权利，这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制度基础。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劳动力迁移中的主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或者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或者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这些迁移不是政府计划配置的，而是市场机制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第三，尊重实践和尊重农民。对农民的择业权利予以充分尊重，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式适时调整政策，保证了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从逐步改革和放宽政策，一直到推动组织制度创新，引导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符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经济结构变革的客观规律。

第四，重视对人的投资。虽然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也是对人的投资过程，但是，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也需要不断地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历程中，一直非常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长。中国政府和农民家庭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近年来，政府对于劳动力的培训也予以高度重视，实施了多项农民工培训计划。在政府针对农村贫困的专项计划中，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培训就是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呈加速上升的趋势。即便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对产业工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工现有的教育和技术水平不足以使中国的制造业升级，这给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挑战，也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人的投资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

(二) 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似与相异之处

1. 发展的一般路径

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看,还是就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经济的特征。中国经济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所走的成功道路,以及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

首先,从资源禀赋的结构看,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相似的。从人口结构看,在经济起飞之前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尚未实现人口转型,即仍然处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阶段。目前,很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这样的人口特征。如果经济发展的模式不能顺应这种现实,那么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

由于在经济起飞之前,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因此,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发展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走重工业化的道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那么,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就偏离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就难以获得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绩效。相反,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大非农部门,并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就有助于逐渐突破二元经济结构,从而实现经济的起飞。中国过去30多年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道路的正确性。

当然,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是与其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有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各自具体的国情,中国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例如,中国人口规模决定了在经济体内部足以形成制造业产品的市场,也容易实现专业化的生产和企业组织方式,但这一条件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具备。类似地,第三产业也可能有符合劳动密集特征的产业部门,而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禀赋特征,选择自身的产业政策。

其次,从减贫的角度看,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取得最有效的减贫效果。如果经济发展的模式背离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那么,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会在总体上偏向于资本的分配,从而扩大劳动要素的拥有者——贫困家庭和资本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使贫困人口在初次分配中就获得改善收入的机会,从而提

高减贫的效率。

最后，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面临着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的制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往往存在着很多制度障碍。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复杂性，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具体措施在各个国家之间不尽相同，但发展中国家往往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劳动力流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我们看到，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是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经济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此，不断地减少、乃至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尊重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市场，并实施减贫战略的必要条件。

2.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当然，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有其独特性。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国还面临着经济体制转型的制约，因此，中国的发展路径也往往由于这些制度性的制约而具有独特性。具体到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就曾经有过“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化过程。在经济发展之初，中国的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农村劳动力虽然迫切需要向非农部门转移，但城乡之间的制度分割仍然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的形式，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并一度成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然而，乡村工业化是否应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普遍模式，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由上个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逐渐转变到向城市集中的模式。乡村工业化难以体现城市化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以及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因此，产生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地区，也逐渐由乡镇企业和发达地区的乡村转向城市地区。由此看来，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历程也无法摆脱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次，即便是中国的乡村工业化，也不是适用于所有地区的发展模式。在上个世纪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大多数贫困地区也难以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模式实现劳动力转移。要实现乡村工业化实际上也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区域市场的发育程度与范围、经济发展的水平、各地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各地在这些条件上的差异，可能使“离土不离乡”模式的适用性也存在区域的差别。

由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有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国情，因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上，并不一定要重复中国的“离土不离乡”模式。无论是乡镇企业

发展还是后来劳动力跨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其内在的逻辑都体现于市场机制渐进发育的过程和对扭曲的制度障碍纠偏的过程。今后中国的发展仍然需要依赖于此，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分享的经验也在于此。

3. 经验、教训与展望

最近 30 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减贫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展望未来，与中国具有类似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和持续减贫，也可以借鉴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经济发展和减贫离不开合宜的制度环境，因此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减少政策的扭曲。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缺乏成熟的市场环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不健全。需要指出的是，建设市场经济环境的过程，也是一个减少政策扭曲的过程，需要在不断消除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制度障碍的同时，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其次，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渐进改革的道路来发展经济。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都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因此，走渐进的改革之路、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渐进的改革方式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纠正可能存在的政策偏差，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付出相对小的改革成本。

然后，就具体的减贫方式看，运用劳动力市场是非常积极有效的手段，然而，也需要注意到，全面减贫需要更加完善的社会政策，以覆盖所有的贫困群体。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验表明，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可以使能够利用劳动力市场的群体迅速摆脱贫困，但随着减贫进程的推进，劳动力转移对于边缘性贫困人口所起的作用减小。因此，全面减贫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保护的全面覆盖。

最后，在突破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要尽量避免贫困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病。然而，我们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城市的不和谐的扩张，例如，城市过度膨胀带来的拥挤、污染和社会秩序的恶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往往带来贫困的转移，造成贫民窟林立。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并没有能够成为改善农村转移人口福利的有效手段。

要使发展中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与人民福利增进统一，以下两个领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其一，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是从农村展开的，而农村改革是发端于土地制度的改革。30 多年前开始推行的农村家庭承包制使农户真正拥有了土地经营权，不仅极大地调动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土地成为维持农民生计基本的、切实的保障。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注重了土地分配的均等性，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公平，赋予了最贫困的群体财产权利。中国的实践表明，农村居民获得长期稳定、权益均等的土地产权，会提高农户非农劳动供给决策的保留工资水平（机会成本），因此，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改进性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其二，要切实避免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成为新的贫困群体，还需要致力于全面的社会保护制度建设。通过逐步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护制度、提高社会保护的水平和、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保护差距，最终实现社会保护制度和水平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口的流动不导致贫困的流动。

参考文献：

- 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蔡昉、都阳(2016)，《应重视单位劳动力成本过快上升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未出版。
- 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第62-68页。
- 都阳(2010)，《农村劳动力流动：转折时期的政策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第90-97页。
- 都阳、王美艳(2010)，《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7-24页。
- 樊坚(2007)，《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贫困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7-21页。
-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6)，《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姜明伦、于敏、李红(2015)，《农民工健康贫困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环境公平视角》，《农业经济与管理》第6期，第17-23页。
- 李树茁、李聪、梁义成(2011)，《外出务工汇款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33-39页。
- 马伟、王亚华、刘生龙(2012)，《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人口迁移：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中国软科学》第3期，第69-77页。

- Roberts ,Kenneth (2006) ,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形势及其变化——最大规模的流动从历时最久的流动中得到什么启示?》, 载于蔡昉、白南生主编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世界银行 (1997) , 《2020 年的中国: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汪三贵、王彩玲 (2015) , 《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贫困村劳动力迁移——来自贫困村农户的证据》, 《劳动经济研究》第3卷第6期, 第22-37页。
- 王美艳 (2014) , 《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 《宏观经济研究》第9期, 第3-16页。
- 武志刚、张恒春 (2010) ,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特点及变化》, 载于蔡昉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1: 金融危机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挑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Chan ,Kam Wing & Ying Hu (2003) .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New Definition , Different Series , and Revised Trends. *The China Review* ,3 (2) ,49 -71.
- Du ,Yang ,Robert Gregory & Xin Meng (2006) . The Impact of the Guest-worker System on Poverty and th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In Ross Garnaut & Ligang Song (eds.) ,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berra , Australia: ANU E Press and Asia Pacific Press , pp. 172 -202.
- Du ,Yang ,Albert Park & Sangui Wang (2005) .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 (4) ,688 -709.
- Lin ,Justin Yifu , Fang Cai & Zhou Li (1998) . Competition , Policy Burdens ,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2) ,422 -427.
- Wang ,Meiyan (2010) .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 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3 (2) ,137 -153.
- Park ,Albert (2008) .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In Shahid Yusuf & Tony Saich (eds.) , *China Urbanizes: Consequences , Strategies ,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 D. C. : The World Bank , pp. 41 -63.
- Psacharopoulos , George , Samuel Morley , Ariel Fiszbein , Haeduck Lee & William Wood (1995) . Pover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1980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1 (3) ,245 -264.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Jia Peng¹, Du Yang^{1,2} & Wang Meiyun¹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¹;

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 Research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²)

Abstract: Rural labor migr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significantly. With the coming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 China has been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s on how to achieve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rural labor migration. This paper uses multiple sources of both macro and micro data to exa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igration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and identify the challenges China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on this aspect. It points out that , new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ocial protection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rural poverty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gration experience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rural labor migration , poverty reduction , social prote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I32 , R23

(责任编辑: 王永洁)